

## 黃帝百年研究綜述

葉修成 梁葆莉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黃帝，既是神，亦是人。在我國古典神話裏，他是一位地位非常煊赫的大神；在我國上古史中，又被後人譽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故關於黃帝的研究，近百年來，綿延無絕，今後，亦將有進無已。因此，對黃帝百年研究史作一概要性的縱向回顧，將有助於我們對其進行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認識，也便於我們從中發現長短得失，並為將來的相關研究亦可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借鑒作用。

從近百年來黃帝研究的特點及其發展狀況來看，我們可以建國為界，約略分作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研究主要表現為史學上的信古和疑古之辯；而後期，諸多專家學者則進行了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的交流與切磋。

一、從晚清到建國前，主要是歷史學上的信古與疑古之辯，這是黃帝研究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

二十世紀初，衆多學者對黃帝來自巴比倫說進行了辯論。此本十九世紀末之遺留問題。蓋因英國倫敦大學教授法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於西元1894年在其撰寫的《古代中國文化西源攷》一書中，認為黃河流域部落聯盟酋長黃帝即是西元前2282年率巴克族(Bak)東遷的嚮南國王那洪特(Nakhunte)，漢族也被假設成是在西元前2300年由西亞移入新疆和甘肅的巴克族。<sup>[1](P24)</sup>

此說既出，駁者甚夥。德人夏德(F. Hirth)在其所著的《中國上古史》一書中力斥拉克伯里的假說為穿鑿附會，不足為信。<sup>[2](P14-18)</sup>

法國學者考狄(Henri Cordier)所著之《中國通史》亦批其人曰：“此人富於神思而拙於科學。其學識博洽有餘而精審不足，既不諳巴比倫之歷史，復不審中國之情形。不顧歷史上之年代，僅依據近人之論著，於此中搜取不甚可信之材料以適合其一己之成見。其學說驟視之頗覺規模宏大，門面輝煌，然稍加檢察即全體瓦解有如冰山之融化。”<sup>[3](P27) ①</sup>

彼時中國學者亦多駁斥其說。清丁謙《中國人種從來攷》云：“西亞古史，中國人種為丟那尼安族。其族分二派，一思米爾，一阿加遜，皆起於亞洲中境。思米爾人先入美索波達米南境，建立迦勒底國。阿加遜人後至沙蛟山麓，建都城於蘇薩，稱嚮南國。其王廓特奈亨台兼併迦勒底諸部，既乃率其種人，遷入中華，謂即黃帝。以此王時代在西元前二千二百八十年間也。但其說不確。因此年數，即彼土亦不衷一，或謂在二十四世紀至二十七世紀。據《竹書》所紀之年，上推黃帝，為二千六百二十年，與第一說不相應，而與第二說差近。但亦無實證，不足為憑。”<sup>[4]</sup>

又陳漢章《中國通史》云：“近今一般地說，並謂中國黃種，皆黃帝子孫，而黃帝實由西北方遷徙而來。按法人拉克伯里說，以奈亨台為丟那尼安種，非塞米的種與黃種合矣。底格里士河邊地，與幼發拉的河側地，並即迦勒底古國，而里海西岸之巴克，並其統領迦勒底國之地，當時實為波斯巴撒迦特人所居。若率巴克民族東來，則東來者乃是白種(西人說波斯古國者，或云哈母種，或云阿利安種，皆白種)，非黃種。且西元前二千二百八十二年，當中國顓頊帝之二十二年，猶得以底格里士河

邊之首長，由土耳其斯坦來中國者為黃帝乎？”<sup>[5]</sup>

丁氏與陳氏從時間和人種兩方面對拉克伯里之假說進行了駁辯。

何炳松《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認為此種假說“至多只能視為西洋新撰之《山海經》而已”。又云：“其立說極盡穿鑿附會之能事，故已為中外史學界所擯棄。”<sup>[6]</sup>

而批駁最為有力且論據充分、說理詳密者數繆鳳林。其在《中國民族西來辨》一文中，從地理障礙、人種不同、年代距離、文物相異、立證不明等五個方面力斥了拉克伯里之誣。<sup>[7]</sup>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若謂吾國茫茫九有，從古初無人類，必待至最近數千年中，始由巴比倫、中央亞細亞轉徙而來，是則理之所不可信者也。”<sup>[8](P7)</sup>

然而，由於當時中國考古發現的局限性，此種理論上的辯駁誠如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所說：“實際上，中國文化西來說與本土說在學術上差不多一樣淺薄，都沒有可靠的考古學上的證據。”<sup>[9](P35)</sup>

以上是清末至民國初年關於黃帝來源問題的辯論，其時對黃帝所處的年代亦進行了探討和推測。

晚清正處於中國近代社會歷史發展變革時期。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時，為了反清排滿，曾改用尊黃帝為始祖的黃帝紀年法。

西元1903年江蘇籍留日學生創辦了《江蘇》雜誌，將第三期的出版日期書作“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sup>[10](P137)</sup>繼《蘇報》被封後刊出的《國民日報》，也以是年作為黃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sup>[10](P138)</sup>

同年出版的《黃帝魂》，卻以西元1903年為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十四年。<sup>[11]</sup>

《民報》是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創刊於1905年10月，在日本東京印刷。其第一號將清光緒三十一年(即西曆一千九百零五年)定為“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sup>[12]</sup>即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

對於此種以黃帝來紀元的做法，呂思勉云：“若以黃帝紀元，則其年代絕不確實矣”。<sup>[13](P32)</sup>柳詒徵亦云：“古無曆法，則紀年必不能如後世之正確。”<sup>[8](P7)</sup>

季清，革命黨人還從現實反滿清帝制的需要出發，追溯華夏族的形成，強調黃帝神話與歷史的關係，重視黃帝神話的教育作用，以凝聚整個漢民族的精神，上引《黃帝魂》一書即是。其後，黃帝便成為中華民族抵抗侵略，振興祖國的精神紐帶，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據1937年4月6日陝北出版的《新中華報》的報導，4月5日清明節時，在延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派林伯渠同志代表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以鮮花束帛之儀致祭於我中華民族的始祖黃帝之陵，舉行民族祭典，以示我黨我軍努力實現民族團結，誓作抗日救亡先鋒的決心。”<sup>[14](P4)</sup>

晚清歷史學家夏曾佑在其所著的《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sup>②</sup>中，將太古三代(即遠古、夏、商、西周——引者按)總稱為“傳疑時代”，分析炎黃之際中國形勢，云：“當炎帝末造，居中國者，約分三族。最北以漠南北為界者，為葷粥，西起昆侖，東漸大海，夾黃河兩岸者，為諸夏；大江以外，及乎南溟，是為黎族。……當時諸夏雖為一族，然似有二支，一炎帝，一黃帝也。”<sup>[15](P18)</sup>又謂：“至黃帝時，生齒日繁，民族競爭之禍，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黃帝、蚩尤之戰事，而中國文化，藉以開焉。”<sup>[15](P18)</sup>遂辨黃帝與炎帝、與蚩尤兩戰，云：“蓋古史僅稱蚩尤逐帝榆罔，而未言蚩尤殺帝榆罔也。殆當時榆罔都蚩尤、黃帝之間，先被逐于蚩尤，後見滅於黃帝。蚩尤所率九黎之民，先在江南，及戰勝榆罔，自號炎帝，時則已逾河北，乃進而益西。與黃帝遇於阪泉、涿鹿之野，已在中國之西北偏。”<sup>[15](P20)</sup>又論黃帝之政教，認為：“今日中國所有之文化，尚皆黃帝所發明也。”<sup>[15](P21)</sup>夏氏於第一編《凡例》中又云：“言古代(指太古、夏、商——引者按)則詳於神話。”<sup>[15](P4)</sup>是則實為後世神話研究

之發蒙。

二十年代初，中國史學界出現了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他們用歷史學的神話學，審查史料，疑辨古史。顧氏從古史的角度對文獻典籍中的上古帝王神話傳說進行了具體而細緻的辨偽，擬撰《帝系攷》，辨古代帝王的系統及年曆、事蹟，惜未最終作成。然其“在燕大所編的《上古史講義》只成了《帝系攷》的一部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即是這一部中的一部分”。<sup>③</sup>但此文“也只說秦漢間的五帝而沒有說殷周間的五帝”。<sup>④</sup>其研究之根本方法：“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sup>[16](P192)</sup>

彼時參與“古史辨派”對“三皇”、“五帝”進行討論的尚有諸多著名學者，如：呂思勉、蒙文通、繆鳳林、齊思和、楊寬、童書業、楊向奎等先生。童書業總結“古史辨派”研究古史的相對的結論大致如次：“‘三皇’、‘五帝’的名稱系統和史跡，大部分是後人有意或無意假造或偽傳的。‘皇’、‘帝’的名號本屬於天神，‘三’、‘五’的數字乃是一種幼稚的數學的範疇，‘三皇’、‘五帝’和古代哲學與神話是有密切的聯繫的。……至於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鯀、禹等，確實有無其人雖不可知，但他們的身上附有很多的神話，卻是事實。把這些神話傳說剝去，他們的真相也就所剩無幾了。……總而言之，夏以前的古史十分七八是與神話傳說打成一片的，他的可信的成分貧薄到了極點！”<sup>⑤</sup>“古史辨派”學者多將“三皇”、“五帝”統而攷之，認為“三皇”、“五帝”乃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於“三皇”研究則甚勤，卻疏於“五帝”之探究，然於黃帝研究專論，則甚為鮮見。惟顧頡剛、齊思和、楊寬諸先生對黃帝尚作了專門探討。

顧頡剛撰有《黃帝》一文，攷究了黃帝之演變，云：“夫黃帝本為卜居昆侖之上帝，藉傳播之力，為十二姓之共祖，為中國歷史之首一王，人矣；而至漢武之世，又以修仙、封禪，騎龍而去。初則由神化人，繼則由人復歸於神，謂非古史上之魂觀耶！”<sup>[17](P183)</sup>

齊思和《黃帝之製器故事》將古籍中所言黃帝之發明，列表比較並攷察其傳說之演變後，認為：“戰國之世，黃帝雖已成為古史傳說之中心人物，尚無製器之說。自韓非倡古聖王以製器而為人民舉為天子之說，於是聖王製器之故事遂作；自《呂氏春秋》稱古聖王皆作樂，於是聖王作樂之傳說以興。然初亦不過人各一、二事而已。黃帝既為古代傳說之中心，製器故事遂亦集中於黃帝，或攘他人之發明，歸之於黃帝；或以發明者為黃帝之臣；於是黃帝製器之故事，遂日征月邁，愈演愈繁矣。”齊氏此文本為駁斥清季流行之“中國古代文明西來”、“中國人種西來”等謬說而撰，故云：“黃帝及本文中所舉之黃帝臣屬以及其他發明者，皆係傳說中人物。其人之有無，已難確定，至於本文中所舉古代重大發明，是否係出於彼等之手，更難確定。但就本文所攷者，已足見此等發明，在中國皆有悠久歷史與傳說之發明者。”<sup>[18]</sup>齊氏以黃帝為傳說人物來否定“中國古代文明西來”、“中國人種西來”等荒謬主張。

楊寬是“顧頡剛先生以後，集‘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人”。<sup>⑥</sup>然其與顧氏在古史上的見解有著很多的不同。顧氏的基本學術觀點是“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而楊氏的古史學是一種民族神話史觀。其在《中國上古史導論》第五篇《黃帝與皇帝》中從神話演變分化的角度探討了“黃帝與皇帝及上帝”、“涿鹿之戰與阪泉之戰”、“黃帝之製器故事”及“黃帝之世系傳說”等問題。其結論如次：

1. “皇帝”本指上帝，……東西民族之上帝本有專名，及春秋戰國之世，既皆一變而為人世之古帝，上帝無專名以稱之，於是泛稱為皇帝，後乃字變而作“黃帝”，亦轉演而為人間之古帝矣。<sup>[19](P196)</sup>

黃帝之傳說出於“皇帝”之字變，初為上帝之通名，故東西民族之上帝——帝俊、帝嚳、顓頊、堯、舜——神話，無不滲入於其間。黃帝傳說其出較晚，故古書所載黃帝尚不脫神話性。<sup>[19](P198-199)</sup>

2. 蓋黃帝伐蚩尤之故事，實出於上帝伐惡神之神話耳。<sup>[19](P200)</sup>

黃帝、炎帝之戰與黃帝、蚩尤之戰，固一事之分化明甚。……阪泉之戰與涿鹿之戰，二者確一事

之分化也。……而戰蚩尤于涿鹿之說，乃又由皇帝伐蚩尤之神話演變而出。然則黃帝傳說之出於皇帝神話，蓋斷斷矣！<sup>[19](P205)</sup>

蓋黃帝、顓頊、帝嚳與堯、舜等無非出於皇帝(上帝)神話之分化耳。<sup>[19](P206)</sup>

3. 黃帝之所以成為製器傳說之中心人物，蓋因其本由上帝神話所演變，上帝本為造物者，其為製器傳說之中心人物固宜。<sup>[19](P207)</sup>

4. 古史中氏族所以一切皆為黃帝之子孫者，蓋因黃帝本為皇天上帝。<sup>[19](P208)</sup>

由黃帝本上帝之化身，故為天下之所共祖耳。<sup>[19](P209)</sup>

另一位亦極富“疑古”精神，但又不屬於“古史辨派”的著名學者，便是丁山。其所著的《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攷》一書雖完稿於一九五零年，然實為丁氏三十年代之研究成果。此書用比較語文學與比較神話學給史前神話加以深入而細緻的分析。其中，從宗教學與天象學的角度研究了有關黃帝的諸多問題。其讚同“古史辨派”的“黃帝即皇天上帝”的說法，<sup>[20](P420)</sup>並認為：“論‘黃帝’名詞的來源，是春秋士大夫糅合后土‘黃示’與‘皇天上帝’兩個天神地祇為一神的創舉，不是晚周陰陽家以五色配五方的原理憑空杜撰出‘黃帝以土德王’的新說。不嫌重複說，周人所謂‘黃帝’，直接蛻變于殷周地神的‘黃示’。”<sup>[20](P423)</sup>又謂：“《晉語》所傳黃帝四妻乃隱射四時，‘二十五子’隱射五行天數，‘別為十二姓’則隱射歲次十二宮與十二月，完全是天空神話。管子所傳黃帝六相，當然也可論定即調曆的‘六術’，也都不是史實。”<sup>[20](P427)</sup>又云：“所謂‘涿鹿之戰’，所謂‘阪泉之戰’，不是什麼民族戰爭，也不是什麼奴隸革命，只是把農業生產者受了旱災的威脅而舉行禱雨的典禮演繹成為禱雨的神話而已。”<sup>[20](P400)</sup>

與疑古派相對立的則是信古派。彼時研究黃帝的主信古者有于右任、王獻唐、徐旭生、錢穆等著名學者。

于右任《黃帝功德記》將黃帝神話傳說之見於載籍者，撮要錄次，分目編纂為“黃帝之家世”、“黃帝與中華民族”、“黃帝與中國文化”、“黃帝之政績”、“黃帝的仙化與陵墓”等，並詳加校正，認為：“黃帝不惟為中華民族之始祖，抑又為中國文化之創造者也。”<sup>[21]</sup>

王獻唐撰有《炎黃氏族文化攷》一書，從考古學、古音韻學、古文字學、古地理學、古民俗學等多個角度，對我國古代炎黃氏族文化的發展變遷作了全面的探討，認為炎、黃“其截然為二族”，<sup>[22](P14)</sup>炎帝族本為黃河流域之土著，後為黃帝所驅逐，“炎裔原在黃河流域東方者愈驅而東，為日後之東夷。其在黃河流域北方者愈驅而北，為日後之狄貊。其在黃河流域西方者愈驅而西，為日後之羌戎。其在黃河流域南方者愈驅而南，為日後之苗蠻。故當時四夷皆炎帝一族，被逐於黃河流域散至四方者也”。<sup>[22](P27)</sup>又云：“當時所謂四夷類為炎裔，黃帝之子孫，皆華夏也。”<sup>[22](P12)</sup>又辨炎黃二族名物禮俗之差異，曰：“黃族入據黃河流域，文明未啟，諸物不備，凡炎族所有，泰半為黃族所無，取而用之，效而製之。”<sup>[22](P198)</sup>

四十年代初，徐旭生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與唐蘭討論古史時，便主張信古。其在所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將我國古代的部族，大致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集團，而炎、黃兩族屬華夏集團，並據古籍文獻、考古文物、民間傳說等方面的材料，推斷出“黃帝氏族的發祥地大約在今陝西的北部”。<sup>[23](P43)</sup>又攷察了黃帝氏族東遷的路綫，認為“他們大約順北洛水南下，到今大荔、朝邑一帶，東渡黃河，跟著中條及太行山邊逐漸向東北走”。<sup>[23](P44)</sup>

錢穆亦著有《黃帝》一書，認為：黃帝“最初活動的地域約在現在的河南中部，後來到達山西南部 and 陝西邊境”。<sup>[24](P5)</sup>又謂：“新鄭附近還有許多地方都和他的傳說有關。”<sup>[24](P6)</sup>且云：“黃帝當時是遊牧部族，……他這一族在文化方面比較落後。”<sup>[24](P6)</sup>並論述了黃帝的降生、武功、文治、製作和發明、長生和子孫等。然僅據古籍文獻載記，皆疏其流，未探其奧，此或許與當時潘公展、印維廉特邀其撰

作此書的目的——將古史傳說人物通俗化有關。

錢穆早年又撰有《黃帝故事地望攷》一文，據古地理著作來攷證黃帝故事中的地理位置，云：“先秦言黃帝登空同，明明在汝許禹密（均屬今河南——引者按）之間，而史公必遠移之關隴之西者，史公自以後世疆域地望說古代史跡，故言黃帝西至空同，必在涼境，若汝州空同，尚在中原，不得為西也。”又云：“黃帝與蚩尤戰涿鹿之野者，其地望應在此（今山西運城安邑、解州一帶——引者按）。”又謂：“攷《一統志》河南陝州，熊耳山在盧氏縣（今同——引者按）南，又有軒轅陵，在閔鄉縣（今靈寶——引者按）南十里鑄鼎原，南北相距，百里之遙。則謂黃帝登熊山，即齊桓之所登，蓋與所謂黃帝上空峒，登具茨，地望皆相近也。”<sup>[25]</sup>

綜觀此期的黃帝研究，可以看出學者們大部分偏重于從史學角度加以探討和研究，形成了疑古與信古之辯，掀起了黃帝研究的第一次高潮，為後期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解放後，尤其新時期以來，對黃帝神話傳說進行了多學科、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與探討，形成了黃帝研究史上第二個令人矚目的高峰期。

建國後至七十年代末，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國的學術研究幾近瀟滯。其時的黃帝研究除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sup>[26]</sup>、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sup>[27]</sup>、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sup>[28]</sup>、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 1955 級集體編著的《中國文學史》<sup>[29]</sup>、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文學史》<sup>[30]</sup>和游國恩、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主編的《中國文學史》<sup>[31]</sup>等歷史著作和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簡略涉及者外，自 1949 年 10 月至 1979 年 9 月，據粗略統計，國內論文僅見四篇，即張筱衡《黃帝陵廟攷》<sup>[32]</sup>、周慶基《黃帝的傳說與仰韶文化》<sup>[33]</sup>、朱宜初《傣族神話中的黃帝和蚩尤》<sup>[34]</sup>與蘊《傳說中的炎帝、黃帝對蚩尤的戰爭，如何解釋？》<sup>[35]</sup>等。其中，周文首次比較全面而系統地利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文物材料以證黃帝的傳說，認為黃帝時代處於仰韶文化階段。朱文則首開運用少數民族活神話化石來研究黃帝神話傳說之先河。

八十年代以降，尤其是隨著 1984 年 5 月中國神話學會的成立，在其組織、宣導和推動之下，學者們對中國神話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整理與研究，對黃帝神話傳說亦進行了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的研討和探究，論著與專文不斷湧現，日益紛繁。茲將相關論著述之如次：

朱天順《中國古代宗教初探》之第七章“中國古神譜”從古代宗教的角度分析了黃帝的神性，認為：“黃帝的神性具有祖神及創造事物之神的二重性。黃帝被幾個朝代的統治階級奉為始祖神，後來變成了整個漢族的始祖神。崇拜黃帝為祖神的主要內容，包括對血緣聯繫的崇拜，以及崇拜他是有功的民族領袖和模範的統治者，即崇拜他帶領本族征服外族的功績和其他德政等。另一方面，黃帝創造事物的神性表現在他始作衣服、創造房屋、舟車、弓矢、以及主管雷雨、能行法術，等等。”<sup>[36]</sup>

何新著有《諸神的起源——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其以文字訓詁為基礎，攷證追跡諸神系的起源和演變，于第二章“一神三身的黃帝”中認為：“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伏羲——太昊——高陽——帝俊——帝嚳——黃帝，實際上都是同一個神即太陽神的變名”。<sup>[37](P34)</sup>又謂：“作為太陽神的黃帝一分為三，分別變成了：太上神黃帝——日神羲和——月神常儀。”<sup>[37](P35)</sup>

張振犁《中原古典神話流變論攷》以從田野作業所獲得的今河南民間流傳的關於黃帝神話傳說的活神話資料為基礎，結合民俗和古籍記載進行比較與分析，於“黃帝神話的傳說和歷史化”一章中探討了黃帝神話在今河南地區的傳說化和歷史化，研究了有關黃帝的涿鹿之戰、建都有熊、具茨山訪賢求道、祭祀河洛及黃帝神話的道教化諸多問題，認為：“從微觀的中原地望攷察，黃帝在禹、密、新（鄭）三縣講武、練兵、訪賢、求道等一系列活動，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事件了。”<sup>[38](P108)</sup>

張氏如此大規模地運用今河南民間口傳的黃帝神話群來研究黃帝神話的傳說化和歷史化，在

黃帝研究史上是一次突破性的嘗試。然只注意到了黃帝神話向傳說化和歷史化一方面的衍變，卻忽略了黃帝衍變的“全過程應該是歷史——神話——歷史，其間神話化只是不可避免的一個環節”。<sup>[39]</sup>今河南民間的黃帝傳說亦可能有從歷史到歷史化流傳的一面。

葉舒憲在《中國神話哲學》一書的第五章“天子明堂”中從比較文化學的角度，借助跨文化的材料——埃及金字塔、蘇美爾天文臺和印加太陽廟來研究“黃帝明堂”，云：“中國的明堂建在南郊以‘就陽’，可知其原始意義當為‘太陽堂’也！”<sup>[40](P159)</sup>又追索明堂起源的歷史之謎，謂：“中國上古的太陽堂不論是否為黃帝始建，它作為觀測太陽的天文臺和祭太陽的神台，一定是某種至高無上的文化中心之象徵。”<sup>[40](P160)</sup>並推知：“太陽堂建築的遠源甚至早自新石器時代便肇始了。”<sup>[40](P160)</sup>又於第六章“黃帝四面”中運用模式分析法，參照世界性跨文化的同類材料——墨西哥、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梵天、澳洲彝神等創世神話來探討“黃帝四面”的問題，認為：“黃帝的四張面孔象徵著由他所欽定的神聖四方空間，因此，‘黃帝四面’這四個字所構成的千古密碼，實應破譯如下：創造主太陽神的迴圈運行‘欽定’了四方和四時。”<sup>[40](P226)</sup>又謂：“若再加上‘黃帝生陰陽’一句密碼的破譯，我們終於可以重構出因理性化的曲解而失去本義、淹沒無聞了幾千年的上古創世神話的原型結構：創造主太陽神從黑暗中出生（昇），創造成光明與黑暗二分的世界，它的迴圈運行欽定出東西南北和春夏秋冬，確立了人類賴以生存的宇宙時空秩序。”<sup>[40](P226)</sup>

此種以世界神話作為廣闊的參照背景，同時廣泛地借鑒和吸收當代國外人文科學發展中的理論與方法，拓展了我們對黃帝神話傳說研究的視野。

何光嶽於其所著《炎黃源流史》<sup>[41]</sup>中，從地名學的角度，根據遠古時代土地名、氏族名、個人名常相合一及族遷名隨的規則，探究了黃帝主族及其裔族、還有四妃所在氏族的來源及其遷徙之跡。然則出於臆度者多矣。

韶華寶忠雙、歐陽如水明所著之《中華祖先拓荒美洲》採用反向思維和全息研究方法於第五章“軒轅族移民美洲”對北美洲易洛魁人奧次頓哥村流傳的《軒轅黃帝酋長禮天祈年圖》和《蚩尤風后歸墟值夜扶桑圖》進行解密，云：“軒轅氏本為天龜，立（帝）龜為竜，登中央領袖位，號黃竜，猶帝龜、帝竜（帝軒）。龜甲 60，得 60 甲子紀年。背甲 13，腹甲 9，裙邊甲 24，定一年 24 節氣，軒轅土星在九重天之上，高踞十三重天，為軒轅帝星，居中天，同環二十八宿，主雷雨，龜頭向天山（昆侖），尾對東南，四足定四方，美洲《軒轅禮天祈年圖》構象明晰，與史載皆相合。蚩尤繼承東夷天文成就，懂天時，黃帝使風后與蚩尤合作，掌歸墟星辰行度，劃定夜間時更，《蚩尤值夜圖》圖示明確。二圖在美洲發現，提供了中華祖先移民美洲的證據。軒轅古星曆，今尚在日本流傳。”<sup>②</sup>

陳建憲以現代文化人類學的視角，於其所著《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sup>[43]</sup>之第九章“戰爭的洗禮”中分析研究了黃帝神話及其 A162“神的戰爭”母題，論述深入淺出，筆法極富文采，為推動黃帝學術研究大眾化作出了一定貢獻。

冷德熙《超越神話——緯書政治神話研究》<sup>[44]</sup>從文化哲學角度利用緯書神話材料於第二章“聖王神話的結構分析”中探討了“三皇五帝”的感生、異貌、受命、禪讓與文明業績等，並與一般民族神話，尤其是古希臘神話和猶太——基督教神話作比較研究。此實為顧頡剛、周予同等先生通過讖緯材料研究“三皇五帝”的後繼，但又有所深化與拓展。然其仍是將“三皇”、“五帝”綜而論之，未對黃帝讖緯神話進行專門深入的探研。

潛明茲《中國神源》之第四章“從歷史到神話”探討了黃帝的名號、時代及其形象演變，其云：“黃帝，實為黃帝族的集中和簡稱的定名，以後與軒轅氏相結合，被稱為軒轅黃帝。兩者的結合，大約是黃帝族由西北進黃河中、下游以後。準確地說，原是黃土高原氏族部落的名號，後發展成一個大部落聯盟的稱號。仰韶文化應是黃帝中期的文化遺址，也是當時較高的文化，屬於新石器時期的中晚

期。有關黃帝族的歷史，均以神話傳說的方式保存著，由氏族名、部落聯盟之名到大酋長之名，三者在原始公社時期本來便可以統一，於是黃帝又成為祖先英雄。其中難免有想像。這些想像非無源之水，非無根之木。由‘黃帝族’變成了‘黃帝’，到戰國時，名聲顯赫輝煌，成為集遠古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於一體的象徵，榮登中華民族祖先的寶座，最終完成了由遠古歷史傳說到神話，又還原於歷史的過程。其間，神話化是不可避免的必經途徑。<sup>[45](P124)</sup>

葉林生《古帝傳說與華夏文明》之第六章“黃帝與生殖崇拜”以較早的傳說資料為依據，結合考古資料探討了黃帝的真相及其氏族淵源，云：“黃帝實際是北方部族原始宗教中的生殖神。”<sup>[46](P181)</sup>

林河於其所著的《中國巫儼史》第六節“黃帝時代的儼文化”中，認為：“少典氏與有蟻氏的文化特徵都應是農耕民族的文化特徵，都應是以儼文化為意識形態的民族。”<sup>[47](P321)</sup>又謂：“黃帝的父氏族與母氏族都不像是北方的遊牧民族，而像是南方的農耕民族。”<sup>[47](P321)</sup>又據四川鹽城的一則關於嫫祖的民間故事，聯繫文化人類學的一個文化現象，即原始民族喜歡用異族人為領袖，云：“黃帝是從南方農耕民族中搶來的氏族領袖”。<sup>[47](P324)</sup>並從文字學和符號學及祭祀歌舞等角度探討了黃帝氏族的文化屬性，認為黃帝氏族兼有巫文化與儼文化兩種意識形態。<sup>[47](P325-330)</sup>

以上介紹了諸多研究黃帝神話傳說的論著，然關於黃帝神話傳說的研究亦不過是其書的一章或幾章而已，而專門研究黃帝的專著甚為鮮見，唯一值得可提的是曲辰的《軒轅黃帝史跡之謎》<sup>[48]</sup>一書，其運用歷史、地理、考古、文字、氣象、民俗等學科知識，對黃帝史事用解謎的寫作方式，對五十多個史謎作了探索性的回答，不過他是屬於“涿鹿派”。其認為黃帝建都於今河北涿鹿縣的礮山鎮三堡村北，死後葬於該縣的溫泉鄉里虎溝村的橋山。

關於黃帝神話傳說資料的蒐集、整理、考訂，亦有較多學者做了此方面的工作。

朱芳圃《中國古代神話與史實》<sup>[49]</sup>之“黃帝”章以古代文獻典籍中有關黃帝神話傳說的資料為主，作了較多的鉤沉、蒐集，資料甚為豐贍，並運用古文字學、古音韻學、訓詁學、考古學、民俗學等對黃帝神話傳說亦作了較詳細的攷證。

袁珂、周明合編的《中國神話資料萃編》<sup>[50]</sup>中的《炎黃編·黃帝》亦輯錄了衆多黃帝神話資料，可供黃帝神話研究者參攷。

且袁珂根據其所收集、整理的有關黃帝神話傳說的散碎資料於《中國神話傳說》<sup>[51]</sup>一書中將其排列、系統化，從文學藝術的角度撰寫了《黃炎篇》，其文通俗易曉，故事性強，為黃帝神話傳說的大眾普及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劉城淮於其所著《中國上古神話》<sup>[52]</sup>一書中網羅見諸古代典籍（主要是漢族古籍——註者按）的黃帝神話傳說，材料甚為賅備，並深入地進行了整理、研究，作了提要、註釋、譯文、說明，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以上介紹了對古籍文獻中黃帝神話傳說資料的鉤沉與整理，另外還有衆多學者對現存民間廣為流傳的黃帝神話傳說的口碑材料加以了發掘和採錄，如：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河南分會、河南大學中文系編的《河南民間故事集》<sup>[53]</sup>中即收集了今河南民間口傳的有關黃帝的神話傳說《黃帝嶺》、《風后嶺》、《雙泊河的傳說》等。

又河北省涿鹿縣組織編寫的《軒轅黃帝的傳說》<sup>[54]</sup>一書亦選入當地口頭傳說的有關黃帝的故事六十九篇。

另據不完全統計，有關黃帝研究的專題論文，自八十年代以降，有400篇之多。專家學者們從神話學、歷史學、考古學、地理學、語言學、文化學、文藝學、人類學、哲學、宗教學、民俗學、民族學、比較學、天文學等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地交流和切磋了有關黃帝的諸多問題。限於篇幅計，在此不贅述，詳見筆者碩士學位論文《黃帝族及其神話傳說攷》<sup>[55]</sup>。

海外關於黃帝研究的成就，亦是非常顯著的。諸多漢學家在研究中國歷史與神話傳說時，對黃帝研究亦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取得了較多創意成果。

日本京都女子大學教授森安太郎論文集《黃帝傳說——中國古代神話之研究》<sup>[56]</sup>推定黃帝的原始本體是為雷龍，即是雷雨之神。又認為陳氏部族以雷龍為自己的祖先神的信仰可遠溯至殷代，以黃帝為皇帝之說是由陳氏（田氏）以黃帝為高祖之信仰而形成的，確實形成的年代是在齊威王時。黃帝之名的形成是起於陳氏在齊勢力已經強大之時，陳氏奪占了姜姓齊的政權，為了摧毀姜姓齊的政治性信仰而有黃帝征伐姜姓炎帝和蚩尤的神話形成。<sup>⑧</sup>此說可能導源於顧頡剛《黃帝》<sup>[17]</sup>(P180)一文。

廣島大學教授御手洗勝《關於黃帝之傳說》<sup>[57]</sup>首先批判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書中所載黃帝之名是由“皇帝”分離獨立而成之說的不當。第二段論黃帝的神容，大致上同意聞一多“黃帝為龍”之說，並進而說明黃帝的本質與雲的種種關係。第三段解釋“軒轅”的本意，認為軒轅的名稱是星座中的龍座或者是人面蛇身者所棲之國名，由此而推論黃帝與龍的種種關係。第四段和第五段檢討黃帝的“黃”字以及黃字字音和少皞之“皞”字字音的關係，攷察伯、皞、黃，皆有其轉音關係，由語音關係而推論黃帝與伯翳、少皞皆是源於一神。第六段推察黃帝與少皞、伯翳性格上的共通點，認為這些神都具有水神的性格。最後檢討黃帝傳說的發祥地，推斷此傳說起源於山東省內部到江蘇北部一帶地方。<sup>⑨</sup>

日人關於黃帝研究的論文尚有池田不二男《黃帝、華胥氏之夢的故事》<sup>[58]</sup>、鐵井慶紀《黃帝傳說》<sup>[59]</sup>和《黃帝與蚩尤的鬥爭故事》<sup>[60]</sup>、御手洗勝《顓頊與乾荒、昌意、清陽、夷鼓、黃帝——關於嬴姓族的祖神系譜》<sup>[61]</sup>和森安太郎《重華的異相與黃帝》<sup>[62]</sup>等。

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研究員李謝維奇《古代黃帝神話與外星人假說》<sup>[63]</sup>將中國古代神話看作是遠古時代與外星文明相接觸的反映，把黃帝等神話英雄解釋為外星人形象。

國外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進一步探討黃帝神話傳說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且拓寬了我們的研究視野。

臺灣與香港亦有較多研究黃帝的論文，如：成揚軒《黃帝的開國精神》<sup>[39]</sup>、徐芳樞《黃帝創業開國的艱辛》<sup>[65]</sup>、林治平《戰勝蚩尤奠定國基的黃帝》<sup>[66]</sup>、張其昀《最偉大的發明家——黃帝》<sup>[67]</sup>和《“黃帝子孫”的源流——三皇五帝》<sup>[68]</sup>、稽古《從黃帝、炎帝談到阪泉之戰》<sup>[69]</sup>、彭友生《論黃帝伐蚩尤不是“民族禦侮”戰》<sup>[70]</sup>、李宗侗《炎帝與黃帝的新解釋》<sup>[71]</sup>、王恢《黃帝都邑考》<sup>[72]</sup>、張光遠《有熊氏黃帝——從考古發掘與經籍古史的印證論》<sup>[73]</sup>、王仲孚《黃帝製器傳說試釋》<sup>[74]</sup>和李甲孚《黃帝其人與黃帝時代的書》<sup>[75]</sup>等。

海外時賢眾多成果對黃帝神話傳說的研究亦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綜上可見，較之第一階段，黃帝研究史上的第二個高峰期，不僅在論著和專文的數量上大為超過前期，而且研究的角度亦多樣化，探索與論述的深度和廣度亦大為拓展，取得了相當明顯的成績。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是多學科、多層次、多視角的綜合研究方法已為眾多學者所採用。不僅有多方面的理論研究，而且還有細緻的古籍文獻鉤沉考訂、民間材料發掘整理的工作，這都拓寬了黃帝神話傳說研究的視野，激起了黃帝研究史上的第二次高潮。於此可見，真正成熟地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研究黃帝神話傳說，才不過幾十年的時間，而成果卻是如此之夥，相信在此基礎之上，未來必有更深入更廣泛的研究。

新時期以來，有關黃帝研究的學術文化活動亦相繼在全國各地開展。1991年5月10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在京宣告正式成立；隨之，全國亦成立了諸多炎黃文化研究分會；同時，一系列高水準的學術討論會也相繼在各地召開，如：“黃帝故里故都論證會”於1990年7月13日在鄭州舉辦、

“黃帝文化研討會”于同年7月15日至17日在河南密縣舉行<sup>[76]</sup>；又“‘炎黃文化與民族精神’學術座談會”於1991年5月11日在京召開<sup>[77]</sup>；又“‘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學術討論會”於1992年5月18日在京舉行<sup>[78]</sup>；又“‘炎黃文化與中原文明’學術研討會”於1992年10月在河南新鄭召開；又“‘炎黃文化與河洛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993年10月在河南鞏義舉行；又“全國首屆涿鹿黃帝、炎帝、蚩尤三祖文化學術研討會”於1995年9月25日至28日在河北涿鹿召開<sup>[79]</sup>；又“上海首屆炎黃文化學術研討會”於1995年12月8日在滬舉行<sup>[80]</sup>；又“黃帝鑄鼎原與中華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於1999年10月16日至22日在河南靈寶召開<sup>[81]</sup>；又“中國首屆黃帝文化學術研討會”於2000年10月5日至8日在浙江縉雲仙都風景區舉行<sup>[82]</sup>；又“黃帝與民族復興學術研討會”於2003年10月2日至4日在西北大學召開<sup>[83]</sup>；又“黃帝祭祀和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於2005年4月4日至8日在西安和延安舉行<sup>[84]</sup>；又“《黃帝故里故都歷代文獻匯典》學術研討會”於2005年4月10日至11日在河南新鄭召開；又出版學術期刊《炎黃文化研究》及編輯資料叢書《炎黃匯典》<sup>[85]</sup>等。此等學術文化活動的開展亦大大地促進了對黃帝的研究與探討。

## 註釋：

- ①漢譯見何炳松《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載《東方雜誌》，第26卷第2號，1929年。
- ②1933年商務印書館重版時改名為《中國古代史》。
- ③顧頡剛《序》，見《古史辨》第四冊，羅根澤編著，4—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 ④顧頡剛《三皇考·自序》，見《古史辨》第七冊(中)，呂思勉、童書業編著，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 ⑤童書業《自序》，見《古史辨》第七冊(上)，呂思勉、童書業編著，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 ⑥童書業《自序》，見《古史辨》第七冊(上)，呂思勉、童書業編著，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 ⑦《提要》，見《中華祖先拓荒美洲》，韶華寶忠雙、歐陽如水明著，2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⑧漢譯見王孝廉《日本學者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載《大陸雜誌》，第45卷1期，1972年。

⑨漢譯見王孝廉《日本學者的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載《大陸雜誌》，第45卷1期，1972年。

## 參攷文獻：

- [1] 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 London, 1894
- [2] F.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1923
- [3] Henri Cord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s*, Paris, 1920
- [4] [清]丁謙. 中國人種從來攷[A]. [清]丁謙. 穆天子傳地理攷證(縮微製品)[M]. 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 1988
- [5] 陳漢章. 中國通史(鉛印本)[M]. 民國間
- [6] 何炳松. 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J]. 東方雜誌: 第二十六卷第二號, 1929
- [7] 繆鳳林. 中國民族西來辨[J]. 學衡: 第三十七期, 1925
- [8] 柳詒徵. 中國文化史: 上冊[M].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8.
- [9] 陳星燦. 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7

- [10] 唐凌. 歷史年代學[M].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2
- [11] 黃帝子孫之多數人撰述, 黃帝子孫之一人編輯. 黃帝魂[C]. 1911年新善本
- [12] 民報: 第1—7號合訂本[N].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57年影
- [13] 呂思勉. 先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14] 黃崇嶽. 黃帝、堯、舜和大禹的傳說[M].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3
- [15] 夏曾佑. 中國古代史[M].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16] 胡適.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A]. 顧頡剛. 古史辨: 第一冊[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17] 顧頡剛. 黃帝[A]. 顧頡剛. 史林雜識初編[C]. 北京: 中華書局, 1963
- [18] 齊思和. 黃帝之製器故事[J]. 史學年報: 第二卷第一期, 1934
- [19] 呂思勉. 童書業. 古史辨: 第七冊(上)[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20] 丁山. 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攷(影印本)[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8
- [21] 于右任. 黃帝功德記[M]. 西安: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7
- [22] 王獻唐. 炎黃氏族文化攷[M]. 濟南: 齊魯書社, 1985
- [23] 徐旭生.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24] 錢穆. 黃帝[M]. 臺北: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1978
- [25] 錢穆. 黃帝故事地望攷[J]. 禹貢半月刊: 第三卷第一期
- [26] 尚鉞. 中國歷史綱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4
- [27] 郭沫若. 中國史稿: 第一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2
- [28] 翦伯贊. 中國史綱要: 第一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9]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 1955 級集體. 中國文學史: 上冊[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
- [30]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編寫組. 中國文學史: 第一冊[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
- [31] 游國恩, 王起, 蕭滌非, 季鎮淮, 費振剛. 中國文學史: 第一冊[M].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 [32] 張筱衡. 黃帝陵廟攷[J]. 人文雜誌, 1957(3)
- [33] 周慶基. 黃帝的傳說與仰韶文化[J]. 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59(1)
- [34] 朱宜初. 傣族神話中的黃帝和蚩尤[N]. 雲南日報, 1963—3—28
- [35] 蘊. 傳說中的炎帝、黃帝對蚩尤的戰爭, 如何解釋[J]. 歷史教學, 1953(10)
- [36] 朱天順. 中國古代宗教初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 [37] 何新. 諸神的起源——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6
- [38] 張振犁. 中原古典神話流變論攷[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1
- [39] 潛明茲. 中國神話學五十年[J]. 民俗研究, 2000(1)
- [40] 葉舒憲. 中國神話哲學[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 [41] 何光嶽. 炎黃源流史[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
- [42] 韶華寶忠雙, 歐陽如水明. 中華祖先拓荒美洲[M]. 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2
- [43] 陳建憲. 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4

- [44] 冷德熙. 超越神話——緯書政治神話研究[M]. 北京: 東方出版社, 1996
- [45] 潛明茲. 中國神源[M]. 重慶: 重慶出版社, 1999
- [46] 葉林生. 古帝傳說與華夏文明[M]. 哈爾濱: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99
- [47] 林河. 中國巫儺史[M]. 廣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 [48] 曲辰. 軒轅黃帝史跡之謎[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 [49] 朱芳圃遺著, 王珍整理. 中國古代神話與史實[M]. 鄭州: 中州書畫社, 1982
- [50] 袁珂, 周明. 中國神話資料萃編[Z]. 成都: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5
- [51] 袁珂. 中國神話傳說[M]. 北京: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4
- [52] 劉城淮. 中國上古神話[M].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8
- [53]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河南分會, 河南大學中文系. 河南民間故事集[Z]. 北京: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5
- [54] 谷生旺. 軒轅黃帝的傳說[Z]. 北京: 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9
- [55] 葉修成. 黃帝族及其神話傳說攷[D]. 貴陽: 貴州大學中文系, 2005
- [56] [日] 森安太郎. 黃帝傳說——中國古代神話之研究[C]. 京都: 京都女子大學人文學會, 1971
- [57] [日] 御手洗勝. 關於黃帝之傳說[J]. 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 第 27 卷 1 號, 1967
- [58] [日] 池田不二男. 黃帝、華胥氏之夢的故事[J]. 中國古代史研究: 第 3 卷, 1969
- [59] [日] 鐵井慶紀. 黃帝傳說[J]. 支那學研究: 第 34 卷, 1969
- [60] [日] 鐵井慶紀. 黃帝與蚩尤的鬥爭故事[J]. 東方宗教: 第 39 卷, 1972
- [61] [日] 御手洗勝. 顓頊與乾荒、昌意、清陽、夷鼓、黃帝——關於嬴姓族的祖神系譜[J]. 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 第 32 卷 1 號, 1973
- [62] [日] 森安太郎. 重華的異相與黃帝[J]. 京都女子大學人文論叢: 第 25 卷, 1976
- [63] [蘇] 李謝維奇. 古代黃帝神話與外星人假說[J]. 今日亞非, 1974(11)
- [64] [台] 成揚軒. 黃帝的開國精神[J]. 幼獅月刊: 第 4 卷 2 期, 1956
- [65] [台] 徐芳樞. 黃帝創業開國的艱辛[J]. 國魂: 第 161 卷, 1958
- [66] [台] 林治平. 戰勝蚩尤奠定國基的黃帝[J]. 民主憲政: 第 15 卷 12 期, 1959
- [67] [台] 張其昀. 最偉大的發明家——黃帝[J]. 中國一周: 第 562 卷, 1961
- [68] [台] 張其昀. “黃帝子孫”的源流——三皇五帝[J]. 中國一周: 第 565 卷, 1961
- [69] [台] 稽古. 從黃帝、炎帝談到阪泉之戰[J]. 暢流: 第 28 卷 7 期, 1962
- [70] [台] 彭友生. 論黃帝伐蚩尤不是“民族禦侮”戰[J]. 新天地: 第 5 卷 3 期, 1966
- [71] [台] 李宗侗. 炎帝與黃帝的新解釋[J].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39 卷 1 期, 1969
- [72] [台] 王恢. 黃帝都邑考[J]. 文藝復興: 第 1 卷 5 期, 1970
- [73] [台] 張光遠. 有熊氏黃帝——從考古發掘與經籍古史的印證論[J]. 故宮季刊: 第 10 卷 1 期, 1975
- [74] [台] 王仲孚. 黃帝製器傳說試釋[J]. 歷史學報, 1976(4)
- [75] [台] 李甲孚. 黃帝其人與黃帝時代的書[J]. 幼獅月刊: 第 61 卷 6 期, 1985
- [76] “黃帝故里故都論證會”與“黃帝文化研討會”分別在鄭州、密縣舉行[J]. 中州學刊, 1990
- (5)
- [77] 王俊義, 黃愛平. 炎黃文化與民族精神[C].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3

- [78] 華上民.“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學術討論會述略[J].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8)
- [79] 宋鎮豪.全國首屆涿鹿黃帝、炎帝、蚩尤三祖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J].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12)
- [80] 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炎黃文化研究論文集[C].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 [81] “黃帝鑄鼎原與中華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在靈寶舉行[J].中原文物,1999(4)
- [82] 江林昌.中國首屆黃帝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J].管子學刊,2001(2)
- [83] 陳戰峰.“黃帝與民族復興學術研討會”綜述[J].華夏文化,2004(1)
- [84] 李桂民.“黃帝祭祀和中華傳統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J].中國史研究動態,2005(8)
- [85] 李學勤,張豈之.炎黃匯典[Z].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